

## 实现自然、社会 and 文化的衔接：评保罗·科布利《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

蒋诗萍

编者：保罗·科布利（Paul Cobley）

译者：周劲松，赵毅衡

书名：《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

ISBN：978-7-305-11363-5

就学界的长期使用习惯而言，“符号学”有两个可以与之对应的英文单词：semiotics 和 semiology。学界对于这两个名称是否有区别，存在争议。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书中指出，semiology 和 semiotics 两个词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前者来源于索绪尔，欧洲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喜欢使用这个名词；后者来源于皮尔斯，说英语的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喜欢使用这个名词。

西比奥克（T. A. Sebeok）并不认为二者的区别仅体现为一种单纯的地域性，更强调划清这两个词的界限，他认为这是了解符号学、进行符号学研究的首要问题，这直接关系到符号学的适用范围与符号学的疆域问题。他很早就用“以偏概全的谬误”的提法来说明 semiotics 与 semiology 之别，意思是“把仅限于人类语言 and 文化的符号作用错误地等同于全部符号作用”<sup>①</sup>。semiology 的适用范围只限于语言与文化，因为索绪尔所建议的符号学“关注的仍然是一切以任意性为基础的系统整体”<sup>②</sup>。他倾向于由洛克（John Locke）最早提出的 semiotics 传统——洛克提议符号的一般研究将是一门自

<sup>①</sup> [美] 约翰·迪利：《符号学基础》（第六版），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

<sup>②</sup>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刘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主的独立科学，它将一方面与自然科学相互协调，一方面与关于文化的科学相互协调，探索利用什么样的手段获得、发展和交流任何领域的知识。据此，西比奥克告诉我们“指号过程应当被视为一种兼属自然和文化的普遍属性”<sup>①</sup>。

约翰·迪利（John Deely）继承了西比奥克的符号学研究思想，他的《符号学基础》一书从欧洲和北美两种符号学传统的区别出发，论证了皮尔斯符号观的合理性，并通过意指作用把自然界、社会和文化各个层面衔接起来，形成了一种大的综合性的符号学理论。近日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伦敦城市大学交流学高级讲师保罗·科布利编著，周劲松、赵毅衡翻译的《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是又一次对西比奥克观点的继承，也是对洛克关于符号学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当中的地位的佐证，更为重要的是向读者展示了当前符号学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和开拓的新领域。

《指南》由“理解符号学”和“符号学中的核心主题和重要人物”两个部分组成。“理解符号学”这一部分是关于符号学的前沿思考，文章均出自国际符号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之手，其中不乏获得“西比奥克奖”的大师，如约翰·迪利、卡列维·库尔（Kalevi Kull）、苏珊·佩特丽莉（Susan Petrilli）、叶斯柏·霍夫梅尔（Jesper Hoffmeyer）。该部分由 11 篇文章组成，《绪论》《古代符号学》《自然符号学》《环境界与模塑》《逻辑与认知》《唯实论与认识论》《皮尔斯、现象学和符号学》《索绪尔的遗产》《社会符号学》《关于媒介与文化的符号学》《符号伦理学》。

这些课题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当前符号学研究的重要论题和方向，它表明符号学已经超出文学和语言学，扩大到生物形式乃至一般意义上的进化过程，这无疑为符号学研究描绘了一个更大和更新的研究框架，与此同时还表明了符号学最为本质的特点，即跨学科性。正如该书的编者保罗·科布利在绪论中写的：“知道诸种动物行为学和生物学等学科以及其他科学的诸多方面对于理解交流的启迪，意义十分重大，这不仅是因为它鼓励了跨学科性，而且因为它促进了更具综合性的知识”。<sup>②</sup>

不仅如此，该书中译本的出版，对于想要在符号学研究上有一番作为的中国读者来说意义重大。符号学的理论渊源极其深厚，中国读者对西方现代

<sup>①</sup> Thomas. A. Sebeok, ed., “Ecumenicalism in Semiotics”, in Sebeok, ed., *A Perfusion of Sig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182—183.

<sup>②</sup> [英] 保罗·科布利编：《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周劲松、赵毅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

理论往往不甚了了，这让中国学者的符号学研究难上加难。而一些学者外语水平有限、获取先进理论的途径有限，直接导致其难以摆脱自话自说或者被牵着鼻子走的研究困境。该书的中译本无疑为中国读者了解西方关于符号学的最新理论成果提供了捷径。该书对符号学理论进行了溯源：符号学的发展由古希腊的占卜、医学始，之后历经中世纪唯识论与认识论的斗争与交错发展，继而在索绪尔与皮尔斯两位巨人手中完备成形，最后经过西比奥克对两种研究传统的梳理和区分，得以完整，并因其所从事的“动物符号学”开辟了非人类符号活动研究新领域，打破了传统的以语言学为核心的符号学(semiology)疆域。

那这一疆域将扩展至何处，也就是符号学研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该书主题便是对符号学研究领域的开拓。尽管“理解符号学”部分只有11篇文章，但涵盖的主题甚广，包括符号学的历史、发展和应用，索绪尔、皮尔斯、西比奥克等人的核心理论，生物符号学、社会符号学和符号伦理学等当代重要的符号学论题，媒介符号学、文化符号学、自然符号学和认知符号学。这使得符号学的研究领域大大打开，实现了社会、自然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衔接；这自然得益于西比奥克充分理解了由皮尔斯提出的“解释项”的价值，他认为在意指过程中该项不可或缺。

该书向大家所展示的符号学领域，从社会、自然到文化，涵盖了今天被称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让我们看到了符号学的活力，看到了符号学的普适性。这对于符号学学者来说，自然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但另一方面，这却可能遭到来自其他学界的质疑，认为这是一种“泛符号学论”(pan-semiotics)。这种质疑是不对的，因为尽管该书所展示的研究范围如此之大，但还未能完全涵盖符号学可以触及的领域。赵毅衡先生认为，“说普天下学问都是符号学的范围，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都卷入意义”<sup>①</sup>，在阐释这一观点时，他引用了王夫子的界定：“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sup>②</sup> 中国人已经看到《易经》符号学“统会天下之理”<sup>③</sup>。

说到此，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符号学思想积淀已久，早在数千年前，《易经》就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到春秋战国时

①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②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周易外传》卷六，岳麓书社，1996年，1039页。转引自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③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期，各学派开始关于“名实”的论争，这种论争延续了两千年之久。但是，这些思想却没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符号学”学科。而《指南》一书对东方的这些符号学思想只字未提，说明中国的符号学传统至今也未能充分融入现代符号学。这跟众多西方学者认为中西方文化不具有可通约性有关。

确实，由于所根植的文化土壤具有极大的不同，许多貌似具有类同性的文学和文化文本有着深层本质的差异，但这也恰好说明了将符号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进行研究的迫切性。运用符号学的阐释方式，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新的解读，将有利于促进中西方的跨文化交流。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符号学研究中明显的缺项，就是未能充分吸收中国的先秦名学、禅宗美学、唯识宗和因明学的成果。东方资源的启示，将把符号学理论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境地”<sup>①</sup>。

这一方面为中国符号学学者创造了弥补符号学缺陷的学术机遇，另一方面也对国内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首要的一步就是掌握现代符号学知识与理论。这本《指南》不仅是一部理论著作，更是一部符号研究的工具书。这样的一本书，似乎充满魔力：给我们一个偷懒的机会，一夜之间获得了符号学的所有知识。不管是否真有这个魔力，但书如其名，它绝对没有指北。

#### 作者简介：

蒋诗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驻所研究员，从事品牌符号学研究。

#### Author:

Jiang Shiping, Ph.D. candidate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and membe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Her research field is semiotics of branding.

E-mail: jshiping@gmail.com

<sup>①</sup>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页。